

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

——两位美国学者学术报告综述

储 昭 华

应刘道玉校长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学者彼德森教授和西东堂大学的印度及东方思想史学家法兰柏高斯基教授来我校哲学系做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论印度佛教》、《论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异同》以及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等四场学术报告。其中,《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是由两人以对话形式合讲的,它是全部讲演的总结和概括,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兹就这场报告的主要观点加以简要介绍。

两位学者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作为西方思想的代表,以印度和中国思想作为东方思想的代表,从中选取若干基本范畴,通过比较这些范畴,分析东西方思想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探究东西方思想彼此应该从对方学习什么。

首先,他们讨论了比较研究的方法问题。彼德森教授指出,提到东西方思想的比较和交流,这就意味着二者存在着差异和隔阂。在东方思想中,许多概念非常丰富、深刻,而且极有价值,但很难翻译成西方语言。西方学者往往是从西方思想的角度,而不是从东方思想的本来意义上来理解这些概念。西方思想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总是力图把思想归结为一系列范畴,用范畴的框架来构筑思想体系。但是,事实上,有些思想、观念却不能这样简单地归结为某个已知的范畴,纳入既定的范畴体系中的。例如,印度哲学和佛教哲学的“自我”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自我”概念就迥然不同。虽然二者都意味着个体,但前者比之后者内涵远为深刻、复杂、丰富。因此,对西方学者来说,要想在研究中完整、准确地把握东方哲学,就必须撇开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避免它的折射,站在东方人的立场、视角上来看东方思想。东方学者研究西方思想也应该如此。只有这样,东西方双方才能真正看到彼此的异同、长短究竟在哪里,从而互相学习,通过交流补充而一起丰富发展。

因此,在比较东西方思想时必须坚决避免过份简单化的倾向,法兰柏高斯基教授这样指出。当然,这种现象在开始是不可避免的。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引进、翻译印度佛经是一件取得伟大成功的事业,开始照样走过很多弯路,犯过很多错误,例如,把“涅槃”译成“天”或“道”显然是极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这表明要把某一种深刻的玄学思想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是异常困难的,有些简直就不可能。他本人也象许多西方学者一样,有过这种教训。在他刚刚进入印度佛教和东方思想的领域时,他和他的同学们关于东西方思想比较的论文,几乎全遭到否定。他的老师批评他是把西方思想投射到东方思想中了。从这个教训出发,他认为,一个西方学者要正确地把握东方思想的实质及其全部丰富内容,有两个必经的阶段:首先掌握特定的语言,读懂经文,弄清各种概念在该思想文化体系中的本来含义,这些思想又如何引起现代研究者的重视,其意义何在。这样,就获得了对于研究对象的一种层次,一个方面的理解;然后,把所得的研究成果,结论放到特定的思想文化的历史和现实中加以修正,补充,从而得到另一层次、另一方面的理解和认识。他撰写博士论文就是那样。他把初稿拿到印度,让印度学者判定是否弄懂了原意,最后,拿到当地的佛教长老那里终审。这样,在不同的层次上获得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关于中国思想也是如此。他在西东堂大学讲授了诸如儒家、道家等不少中国学派,那是一种理解。到了中国,通过同许多中国学者的交流讨论,使他又得到了更深

更新的理解,发现以前的一些理解却是错误的。这证明,东西方思想的比较,交流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决不能简单从事,我们在研究中,不仅要凭借我们的感官,更要依靠我们的理性,即“心灵”。

接着,他们分别比较了东西方思想中一些基本范畴的不同含义。比较的第一个范畴是“心灵”(Mind)。

彼德森教授以亚里士多德的“心灵”范畴代表西方的“心灵”思想。在亚氏看来,人之所以为人,有两个因素,一是人的“心灵”,这是人的认识能力,其二是意志。亚氏认为,人的心灵能够认识一切事物。人能设想一个非常一般的、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并思考,认识这个抽象、普遍的真理。人能思维“善”。这种“善”不是一个个个别的好东西,而是抽象普遍的“善”。反过来,人因而能够认识一切个别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反映这些普遍概念。从此出发,亚氏建立起他的“意志”概念,主张人能认识的一切东西,人都能选择。心灵把握了整个的“善”,因而可以选择任何善的东西,可以拒绝任何不完善的东西。在亚氏那里,心灵能认识一切东西,意志则能充分自由地选择一切东西。等于这两个概念,他提出通过两个方面来分析人的本性,其一是直接看人的本性,就象通过分析语言来认识真理一样;其二是通过观察人们的所作所为来认识人的本性。亚氏的“心灵”范畴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思想,导致了两种倾向:基于“心灵”的本性,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由于自由意志的存在,个人有权选择他所喜欢的一切,因此,我们评价亚氏的“心灵”思想,必须做两方面分析:一方面,他肯定人的心灵能够认识真理,这无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如果以为根据亚氏的范畴体系就能认识一切事物,那就错了。一方面,人有凭借自由意志选择的能力;另一方面,这种选择必须受理性的限制;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的本性的分析来判断是非,另一方面,这种判定决不能由一小群人来决定。在西方思想中,以亚氏开始,人的认识过程被认为是纯逻辑的,总是倾向于认为真理是清楚明白的,是可以凭借逻辑范畴轻易认识的。而东方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则有所不同。

印度伟大的思想家集塔纳认为,真理只是受局限的知识,因此就是无知。他把人类知识用梵文定义为“无限”。在中国的庄子看来,孔子、墨子、韩非子等各家自成一派,互相攻击,其实,他们都是全对又全错。在禅宗的思想中,则主张通过各种途径来泯灭人的逻辑理性思维,而寻求“顿悟”。东方具有一种极为深厚的传统:任何思想的深刻、丰富的内涵并不体现在那种简单的、逻辑的、理性的思维之中,而在于追求一种更完整的人格。印度的瑜伽,吹捧多学派、中国的老子、庄子及王阳明等许多学派都主张无智无识。这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人靠心灵、生活的观点正好相反,而现代西方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则肯定了这一点。如果把它们的差别打个比喻的话,则是西方人是站着思想的,通过广阔的视野,外界感觉,观念进入大脑,形成认识,再指导行动;而东方人则是睡着沉思,作涅槃超脱的梦。

与“心灵”概念相对的是“情感”概念。亚氏认为,人是肉体与心灵的联合体。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因素是人的心灵,在心灵之外,是人的诸如爱、恶、惧、怒等情感。只有具有情感的人才是一个完全的人。在亚氏看来,整个宇宙存在着一种完美的秩序,在更小的宇宙——人身上也能看到一种完美的秩序。情感虽然只是人的一部分,但它必须受心灵的支配。这就要求心灵象完美地认识世界的秩序那样,完美地控制一个人。这一思想尽管有所变化,但在西方思想中也形成了一个潮流:对情感持一种怀疑态度,主张由心灵控制情感。

不仅情感在西方思想中不被重视,直觉也多遭贬责。对亚氏和大多数西方思想家来说,任何思想都是从一定的前提达到一定结论的逻辑过程,直觉,非语言的交流是靠不住的,因而这些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西方思想认为知识完全是理性的、逻辑的,而东方思想则认为知识是一种直觉、一种顿悟、一种是而未决的东西,它是一种智慧。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却为东方思想提供了论据。

法兰柏高斯基教授指出,如果我们站在印度思想的立场上探究心灵概念的实质,就会发现它与西方的心灵概念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其中关于“自我”的概念。在印度哲学特别是在瑜伽的传统中,“自我”概念是非常重要的。“自我”是人存在的首要前提,通过“自我”,我才能有对对象的认识。如果仅限于此,那么“自我”的意义就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瑜伽修行者寻求的是一种更广阔、更深刻的“自我同一性”。瑜伽的静坐正是为了帮助人们更深入地发现自我的意义。在瑜伽看来,身体的修行是为心灵服务的,身体、物质上的追求是为了发现更深的意识。这不只是瑜伽的思想,佛教和道教也坚持同样的主张。这是东方文明给西方思想的第二个启示:人的意识具有不同的层次,而且身体的修行有助于人们发现、探求各种层次的认识。而西方只是到了很晚的时候才开始探求其它层次的认识。

透过心灵概念的比较,可以看到,在西方思想中,心灵能够而且必须控制身体的运动,在东方思想特别

在印度哲学中，身体则是为心灵服务的，在西方思想中，情感会将心灵引入歧路，在东方思想特别在瑜伽中，身体修行有助于发现心灵、产生顿悟。

接着比较的是“经验”的范畴。他们认为，东西方思想都很重视经验，但西方重视经验比东方晚得多。关于经验的最基本的问题在于它在知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亚氏认为，知识是通过对本质的分析而得到的。如果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话是谎话，就要分析人们的语言；如果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谋杀是错误的，那就要分析人的本性。我们只有通过事物的本质、要素的分析，才能得到关于事物的概念和知识。在他那里，还没有提出通过分析经验而获得知识的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直到很晚以后，才有两个哲学家提出了这一思想。一是克尔凯哥尔，他强调分析个人的经验，另一个人是海德格尔，他强调分析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的经验。与亚氏相反，克尔凯哥尔认为知识只有通过分析个人存在的经验才能得到。他把经验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感性的经验，这是一种简单的经验，没有判断，就象小孩所感受到的那样；第二种是道德伦理的经验，这是根据判断而得到的经验；第三种是宗教的经验，这是对上帝的虔诚和恐惧的经验。他认为，人的本性总是作为个人的本性而存在的，所以这种本性总是存在于个人的经验之中。说话的真假，除了要分析语言外，还要对个人在此时此种环境下的特殊境遇加以分析，才能得到关于语言真伪的知识。从此西方思想，从过去集中探究人的一般的、抽象本性，转向探究此时此地的个人的本性。海德格尔更进一步，他把人定义为不仅是一种理性动物，还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要获得知识，不仅要分析事物和人的本性，不仅要分析此时此地的个人的本性，还要分析个人存在于其中的文化的本性。在西方思想史上，起初强调的是文化整体，随后在宗教那里，开始了对个人经验的探究，至此才真正形成对经验分析的思想。

在东方思想中，对经验的重要性的认识要早得多。孔子说：“不知人，焉知天。”佛教更是不关心那种玄秘、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而主张面对人生，首先考虑人的境遇。人生就好像被箭射中，首要的是要把箭拔出来，使人生得到超脱、拯救、拯救的办法就是依靠人的经验，身体修行。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佛徒是世界上最早的存在主义者。所以，才有人提出，人类思想开始向东方回归了。

由此得出东方思想对西方思想的第三个启示：我们的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的理性，还要研究人类的经验，不仅要获得知识，更要探究生活。人的生存、发展和死亡，是哲学所面临的最现实，最根本的问题。

两位学者比较的最后一个概念是整体概念。整体概念是亚氏在讨论整体的普遍的完善与个体的完善相互关系时提出的。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该按照他的能力、天赋来发展。同时，亚氏指出，整体的完善在个体的完善之上。尽管他把这一点作为他思想的前提，但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他更强调的是每个人作为个体的唯一性。他主张个人只能在社会中存在，但他往往把个人从社会中抽象出来，分割开来，作为单个个体来研究，主张只有我的一切才是重要的。即使我比别人无知，但我的思想具有同样的价值；即使我看不到我与你的关系，我也一样可以认识自我。这种对个人的强调，在西方思想上也形成了一种思潮：强调我而忽视你，强调个人而忽视整体，因而有人把亚氏的思想视为西方个人主义的源流和基础。当代哲学家认为，尽管亚氏并非有意成为自私的个人主义的鼻祖，但他对个人的唯一性，至上性地强调客观上造成了这种后果。波普尔完善了这一思想。一方面，他承认亚氏对个人的强调，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个人只能看成是社会整体的一个分子，个人的小我是集体大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种思想在东方却是古已有之，而且非常突出。

有位研究东方哲学的西方学者纵观整个东方的哲学史，发现这是一部最完整、统一的哲学史。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比之任何其他文化，它的整体的思想观念和实践最为突出、鲜明而完整。西方人称他的文化为“我的一代”，今天社会要求个人作一定的无私和牺牲，以赢得整体的和谐和发展，而中国思想一直坚持并教导这一观念，孔子的儒家崇尚忍让、宽恕、仁爱，以社稷为上，以求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道家更是追求人与自然圆融一体的理想境界。

如果我们把宇宙比喻为一个圆圈的话，西方思想家把自己看作是这个圆圈的中心，老庄等中国思想家则教导人们走到这个圆圈中去，不是去主宰、支配它，而是与它取得一致，最终溶为一体。在他们看来，个人的位置只有在整个世界中才能找到，而不是在小小的自我之中。

西方思想由此得到的第四个启示是：个人与整体的相互关系问题，对于更深地理解人的价值和意义具

张诬蔑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对毛泽东进行“无情打击”，先后撤销毛泽东在党和红军内的职务，完全取消了他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志，由于没有贯彻他们的错误路线而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因而被说成所谓“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也遭到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是，对同他们气味相投，意见相合的人则相反。李德由于同他们的军事路线相合，他们就同李德配合得非常密切，以至把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李德。李德在他们的支持下则独断专行，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太上皇”。

总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在它的决议和指示的影响下，极力推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排挤以至完全剥夺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而让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以其军事教条主义的个人领导取代中央军委的集体领导，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可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政治、军事

和组织上推行错误路线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们要负主要责任。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所犯的这些错误都与共产国际有关，所以共产国际也负有重要责任。

注释：

① 《聂荣臻回忆录》，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集，第6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②③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204、219页。

④⑤ 《六大以来》（上），第671页。

⑥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獻资料》第2辑，第183—184页。

⑦⑧⑨⑭ 《六大以来》（上），第404、510—513、517、198页。

⑩ 《彭德怀自述》，第192页。

⑪⑫⑮ 杨云若编：《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第104、109—110、103页。

⑬ 《伍修权回忆录》（之一），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第17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上接第127页）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个人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他只有在与社会整体的和谐一致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完善发展。

最后，两位学者就教育，生态平衡和和平三个方面对东方思想的精华做了简要的总结。

教育。在亚氏那里，主张教育是一种普遍的经验，应该使受教育者达到最终的概念，认识宇宙，认识他自己。他把所有的学习和研究都归结为哲学的研究，以求达到一种整体的学习、教育。随着历史的发展，在西方，这种教育方式逐渐被分门别类的部门、职业性的教育所代替。相反，亚氏的主张却是东方的教育方式的写照。东方的教育强调人类对于整体性的追赶，以求达到整体性的人格。这是值得西方人借鉴的。

生态平衡。西方思想从亚氏开始，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宇宙的主宰，表现在行动上，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忽视了自然的神圣性，污染空气，滥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东方思想强调人是宇宙的一部分、追求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这种整体思想有助于西方人生态平衡观念的巩固和发展。

和平。亚氏把和平定义为平静的秩序。在西方思想和西方社会中，着重强调的是秩序，而忽略了平静。和平是需要以极大的努力来争取并保持的。我们西方人总是到外在世界去寻求和平，而忽视了到内心去寻求平静。佛教徒通过对佛的沉思冥想，而产生对和平的追求。不仅佛教这样，整个东方思想都具有这一特色。这种对人内心平静的追求也是值得西方人思考、学习的。

注：

这个综述是根据讲演的录音整理而成，讲演者是即兴而讲，无讲稿可核对，发表时也未经讲演者核准，错误之处请读者指出。至于观点，则是根据录音，未加修改。